

龙岩文史资料

(第一期)

(初稿)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福建省龙岩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1309
1981

目 录

邓子恢传(连载)	蒋柏英 邱林忠 邓芳梅 黄祖洪	(1)
郭滴人传略	郑学秋 郭翔	(6)
闽西事变与半山事件等革命历史片段的回忆	林映三 (邱林忠 奎理)	(11)
闽西汉剧源流初探	张垣	(16)
大革命前后的龙岩(上)	陈仙海 邱林忠	(18)
苏维埃时期的龙岩儿童团	郭翔	(24)
回顾国共两党在闽西的合作	李伟夫 (郭奎 杰理)	(27)
记闽西起义	陈天祥	(32)
翁矮古起义	陈怀仪	(36)
土地革命时期歌谣	中生 方中辑录	
龙岩之“最”	方中辑录	
封百设计	郭津良 尹德茂	

目 录

邓子恢传(连载)	蒋柏英 邱林忠 邓芳梅 黄祖洪	(1)
郭滴人传略	郑学秋 郭翔	(6)
闽西事变与半山事件等革命历史片段的回忆	林映三 (邱林忠 奎理)	(11)
闽西汉剧源流初探	张垣	(16)
大革命前后的龙岩(上)	陈仙海 邱林忠	(18)
苏维埃时期的龙岩儿童团	郭翔	(24)
回顾国共两党在闽西的合作	李伟夫 (郭奎 杰理)	(27)
记闽西起义	陈天祥	(32)
翁矮古起义	陈怀仪	(36)
土地革命时期歌谣	中生 方中辑录	
龙岩之“最”	方中辑录	
封百设计	郭津良 尹德茂	

邓子恢十三岁时，母亲因病去世了。为了母亲的墓地，邓家与邻村大姓发生风水纠纷。邓家因势单力薄，输了这场官司，母亲坟地也横遭破坏。父亲被逼迫，出走广东，一九一九年，病逝于南雄。这件事，对少年邓子恢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对于世道的黑暗，官场的丑恶和弱肉强食的社会，深感厌恶和愤慨。

一九一三年，邓子恢考进了龙岩县中学（一九一六年改为福建省立第九中学）。他以焕发的青春和旺盛的求知欲，刻苦攻读，勤于钻研，各科成绩均在优等之列。辛亥革命的隆隆炮声，震开了满清王朝的宝殿。邓子恢和同志们被革命成功的希望鼓舞着，期待着祖国富强、百姓安居乐业、歌舞升平的好日子。他们常常结伙漫步城外东宫山龙岩洞等名胜古迹，与同志们共同研究时局，交流思想，畅谈远大的抱负和前程。

但是，清朝皇帝被赶下宝座以后，脆弱的中国资产阶级并未能主宰中国的命运，一切胜利果实都又落到了以清廷宠臣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里。北洋军阀上台以后，中国大地依然是在黑暗的封建统治之下。袁世凯卖国求荣，引狼入室，取媚于日本帝国主义，并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这些无情的事实，打破了邓子恢美好理想，使他看清了北洋军阀的卖国嘴脸。

一九一五年，邓子恢和被爱国热忱激愤着的同学们一起，走上龙岩街头，揭露北洋政府的卖国罪行。他奔走在游行队伍前列，发表激昂慷慨的演说，呼吁民众起来，一致抵制日货，坚决反对卖国的《二十一条》。在这前后，邓子恢逐渐接受了孙中山先生提倡的三民主义思想，秘密加入了中华革命党。

龙岩省立九中是在地方豪绅把持下的学校，推行封建专制教育，禁锢学生思想。邓子恢对学校的封建教育制度极为不满。一九一五年秋，校长魏梦云聘请了一个兵痞担任体育教员。那个教员带着指挥刀上课，施行封建法西斯式的教学方法，并任意抽打学生。丙班班长林仙亭、邓子恢当即发动全班学生签名反对，要求校方解聘这个教员。学校当局不仅不接受学生的合理意见，反而贴出布告，开除林仙亭，并将该班四十二名学生集体记过处分。邓子恢见此布告，十分愤慨，一把将它撕了下来，带领同学们去向校长提出质问。接着，学生们集中到校外的一个祠堂里秘密开会，商讨对策，议定次日罢课。罢课后，学校当局竟又宣布开除林仙亭、邓子恢、林鸿伟等七名学生。

学校当局对学生的一再迫害，引起了全校同学的愤怒。同学们平日由于备受专制统治已积不满情绪，早有发动风潮的趋势。事情发生后的第六天，全校学生一致罢课，公推邓子恢、林仙亭等为代表，请求学校当局收回成命。校长看到事态越闹越大，惊动了县知事和地方士绅，怕难以收场，闻风回避，不见学生代表。唯独地理教员、劣绅杜连茹站在校长室里，蛮横地拍着桌子说：“现在还有什么学生和先生的关系可说，分明是原告对被告而论了……”学生们一听此言，犹如火上加油，更加义愤填膺。邓子恢也拍起桌子厉声说道：“不错！我们就是原告，请被告的站出来！……”经过同学们坚持不懈的说理斗争，学校当局最后不得不收回开除学生的成命，而把那个体育教员解聘了。

一九一六年底，邓子恢中学毕业了。这一年，他与邻近黄坊社南阳乡的农家姑娘曹泉地成了婚。当时，龙岩县公署筹措了一笔公费准备保送几名学业优良的学生赴日留学。邓子恢参加了考试，作了一篇《游龙岩洞记》，以优异的成绩获取了公费留日的资格。翌年二月，东渡日本，寓居于东京神田表猿乐町二十二番岩本方，先后在东亚补习学校学习一年多。

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中国民族工业有了一点生机。一时间“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思潮在知识分子中间颇为流行。邓子恢也决心努力读书，以图回国后用自己的知识来解救祖国和同胞的苦难。他除了勤于学习日语之外，还如饥似渴地专攻数理化，一心一意想投考日本第一流的东京帝国大学进行深造。邓子恢在日本，由于旅费在东渡的海轮上被窃，经济极端窘困，家里只好把他妹妹出嫁的一点聘金寄给他维持。他节衣缩食，勤奋读书。但由于他长期的贫困和苦读，终于积劳成疾，患了肺病，严重时吐血不止。同学们都很同情他。大家募集了一些钱帮助他进入东京“杏仁堂”医院治疗。经过一个时期，病体稍愈，逐渐恢复了健康。

邓子恢留日期间，目睹了日人蔑视华人的状况，华侨备受欺凌，益发增加了爱国情绪。虽然这种爱国思想还很空洞，不知道如何来行动，但这时候的邓子恢，已经是一个才华初露的青年，在朦胧的思想意识中，他艰苦地寻找着救国救民的光明之路。一九一八年四月，我国留日学生千余人发动了抵制“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爱国运动，到中国驻日本使馆门前请愿示威。邓子恢和其他学生代表冲在前面，要求驻日大使章宗祥出面交涉。这一举动遭到了日本政府的弹压。留日学生便一致决定回国，以示斗争决心。

(二) 走上革命道路

一九一八年四月，邓子恢从日本返回祖国，重又回到了万山重叠的故乡。

当他回到家乡时，眼看靠父亲行医和继母、妻子种田收入微薄，不够养家，日子过得很艰难，求学深造的路也已断绝。他起先想当个小学教员，但薪金少得可怜，无以养家。经过一番磋商，乃决定改学从商，于一九一八年底，前往江西省崇义县的杰坝镇堂兄开设的“庆昌和”杂货店当店员，一直到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以后，才被迫离开赣南。

邓子恢前往江西崇义时，正好二十二岁，在崇义前后将近九年。这个时候，正是我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转变、马列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中国共产党建党的时期，也是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后进行北伐战争的革命时期。对于邓子恢来说，则是由受康、梁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影响，到信仰孙中山的革命民主主义，进而完全抛弃了那种政治主张，开始信仰共产主义的极为重要的时刻；也是他由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到开始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从事革命实践的时期。

在学生时代，邓子恢的政治思想是摇摆不定的。在一段时间内，他在各种繁杂的政治主张之间探索和徘徊，试图找到一种合乎中国国情的出路。起先，他由于常看康、梁文集，颇受康有为、梁启超改良主义的影响。不久，读了孙中山文集，又接受了三民主义的影响，一九一五年在中学读书时，他就曾秘密加入了中华革命党。一九二〇年，他阅读了无政府主义书籍，又向往无政府主义。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的革命浪潮波及到闽西、赣南的穷乡僻壤，龙岩的进步青年学生举行示威游行，响应北平的爱国学生运动。不久以后，各种新思想，新文化不断地涌来，冲击和影响着这一带的进步青年知识分子。邓子恢在这个时期看了《新青年》、《新潮》、《湘江评论》等革命刊物，思想上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逐渐接受了新思想和新文化。不久，他在江西崇义看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便开始信仰共

产主义。一九二二年，他看到了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响导》，知道中国也有共产党组织。他非常高兴，当即写信给陈独秀，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是，一直没有得到答复。

一九二一年春，邓子恢从江西崇义回到家乡，在桐冈小学担任短期的小学教员。龙岩自从一九一八年陈炯明入闽后，一直在以劣绅杜连茹为首的封建势力统治之下，他们建立了一个叫做“庚申俱乐部”的全县规模的组织，与当地驻军相勾结，包揽诉讼，操纵金融，无恶不作。邓子恢看到这种现象，十分愤慨。这时候，他受了“新思潮的洗礼，对于社会现象，极感不满……思改造之道，其入手办法，就是联络振动数和振动幅比较的相同者——同志，起而互助合作，先从改造个人做起，而后及于改造社会。”^①他在这种“改造个人”和“改造社会”的思想指导下，决心团结一批进步青年，灌输和宣扬新思想。他与陈少微（陈明）、章独奇、张觉觉、林仙亭等进步知识分子，发起组织了“奇山书社”，社址设于自土奇山书院，参加者前后共达二百余人。社员大多是一些思想倾向于社会主义的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和小学教员。书社经常组织大家阅读《新青年》、《新潮》、《响导周报》、《湘江评论》、《共产党宣言》等书刊，并组织讨论和研究。一九二二年，书社把社员们所写的读书心得油印成《读书录》，第二期又改为《同声》。

一九二三年夏，邓子恢又从江西崇义回到家乡。为了揭露社会黑幕，报道群众斗争，推广革命思想和宣传社会主义，他与张觉觉、章独奇等商议决定将《同声》更名为《岩声》报。并把编好的稿送到厦门印刷，公开出版发行。他亲笔题写了刊名。同年九月一日，《岩声》报创刊号便与世人见面了。

《岩声》创办的宗旨在于“在事实方面作实际的调查，把有关于地方之事，为之宣达披露，以促起多数民众的注意，而便于讨论研究和改良。在理论方面，为新文化运动取各种最新学说，实为吾岩社会所急需者，为之宣传鼓吹，以刷新知识阶级的思想，而使之指导民众，走向进化途中去，总束一句话：本报最大之使命乃在：改造旧社会，宣传新文化。”^②《岩声》报先后办了三年多，共出版四十四期，（一说四十五期）发行量达七百余份，在国内销至福建、江西、广东、台湾等十二省的三十五个县市，国外远销至新加坡、日里、檳城等七处。

《岩声》报创办以后，邓子恢以此为阵地，无情地揭露旧社会的黑暗统治，热情传播马列主义。他在龙岩和返回崇义后，连续不断地撰写了大量文章，在《岩声》报上发表。例如《告借粮当道》、《恐怖的生活》、《更进一步的绅阀与财阀》、《龙岩被压迫阶级的现状及其出路》等，都是当年邓子恢锋芒初露、才华横溢的作品。

邓子恢在崇义当店员时，对于马克思提出的剩余价值理论，作了认真的研究，并在社会实践中有着深刻的体会。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他写了一篇《恐怖的生活》，以通俗和精辟的言词，形象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理论核心：“所谓‘剩余价值’不是我们贫苦的致命伤么？不是富人向人群掠夺的证据物么？我们对于别的掠夺方法——打抢、诈骗、敲竹杠、重利——还有些知道，特这种无形的打抢诈骗敲竹杠，都看不出来，不提防他！我们的所有权，正刻刻在此不公道的打抢的交换里，被掠夺而去！地球上什么土地、房屋、机器——生产工具，都无不在此交换的形式下，慢慢地集中在一般狡猾的富者之手！”

①《岩声》报第十二期，《本报之过去现在及未来》。一九二四年。

②《岩声》报第一期，《岩声宣言》。一九二三年。

我们现在只有赤条条地，赤手空拳！……马克思说：‘工人的能力，必须能增加资本（富者的财富）才有工做’……

“朋友不恐怖么？无产者死亡的趋势，越看越明了！我们怎么办？竟安于恐怖么？坐待这死亡之至么？不！不！不！！我们难道连生命都不要？”^①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邓子恢在《龙岩被压迫阶级的现状及其出路》一文中，明确而响亮地提出了必须砸烂旧的国家机器，以武装来夺取政权的革命道理：“事实告诉我们，‘政权是统治阶级的武器’，‘武力是夺取政权的条件’。现在的政权，正落在我们的敌人——军队、资本家、绅士之手；他们仗着他们军队的武装势力，正在拿政权来统治我们，来压迫我们；我们不得不屈从他们的支配，不得不忍受他们的榨取。反过来：如果我们一齐觉悟起来，一齐武装起来，我们也很容易拿着政权，一面解除他们横暴的武装，一面改革他们作恶的制度，使我们的社会，渐渐朝着和平快乐的方面走去……”^②

邓子恢在《岩声》报发表的大量文章，政治观点十分鲜明，战斗性极强。正如《岩声》报编辑余谈中说：“他的文字，最有气魄，最为精悍，针针见血，力透纸背。使人看了，叫快叫痛。”^③从这些文章内容看来，邓子恢接受并信仰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的人生观也已初步形成。

一九二五年秋，邓子恢由崇义返回龙岩。当他路经厦门时，经友人介绍，参加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有共产党人参加的革命统一战线组织——中国国民党，并受委托回龙岩发展了四十多名党员，成立了龙岩县国民党党部。当时，他对国民党的革命性是肯定的。认为与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是一致的。当他在填写登记表中“为什么加入国民党”一栏时，他回答是：“因为国民党左倾联共。”^④随后，他又回到崇义，发展了一批国民党党员，成立了崇义县杰坝区国民党党部，邓子恢担任党部常务委员之职，领导当地的工农群众运动。

一九二六年秋，北伐战争的大炮，轰开了赣南山区一座座古老的城墙，北伐军从广东进入了赣南。邓子恢和崇义县的革命知识分子陈赞雍等，在县城杰坝、长潭一带，组织群众欢迎北伐军入赣，在工人、农民中间进行革命宣传活动，组织了工会、农会，取消了一些苛捐杂税，打倒了一些罪恶昭著的土豪劣绅。邓子恢日夜奔忙于工农群众之间，成为当时崇义杰坝地区最为出色的革命者之一。

一九二六年冬，崇义县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同年十二月，邓子恢由中共崇义支部书记陈赞雍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任支部宣传委员。从此，他以一个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姿态，积极勇猛地投身到了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革命洪流中去。（待续）

①《岩声》报第七期。一九二四年三月。

②《岩声》报第三十二期。

③《岩声》报第十二期。

④《邓子恢同志谈闽西党史》，一九五四年。

郭 滴 人 传 略

郑学秋 郭 翔

郭滴人于一九〇七年十二月八日出生在龙岩湖洋乡后陂村的一个贫农家里，乳名“客仔”，进入小学时，老师按辈数为之取名“上宾”。其父郭荣章忠厚勤俭，终日劳累却无法换取一家温饱。以世代文盲，受尽欺凌，乃决心节衣缩食让滴人进入族办积山初小学习，其后转入乡办开明高小。滴人每天课余回家，都必帮助母亲操持家务，在校则勤奋学习，每次考试成绩，都列前茅。他能写一手隽秀遒劲的好字，村人喜庆贴对联，多有请他书写。他从小耳闻目睹贫苦农民累遭欺压的不平事，自己也备受富豪子弟的凌辱，心里蕴结着一股愤懑的火苗，每与同学嬉游“演说”时，他总爱讲述《水浒传》中抑富济贫、敢于造反的篇章。他带领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去捉弄下乡催征赋税的县官，把烂污泥抹在官轿的座位上；他也曾闯进祠堂“监视”土豪族长的算账，而被斥为“滚地龙”。小学毕业后，不少同学升入中学，郭滴人家境穷困，不敢问津，乃辗转到漳州，在叔父郭涵波的小杂货铺里当学徒。每天劳动之余，他常手不释卷，孜孜向学。其时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创办的集美师范免费供给贫寒学生伙食、制服、被帐。郭滴人征得叔父同意，勉强资助他旅费及些微零用钱（叔父是小商，家累重，无法大力支持），遂与同乡好友郑日晖、黄振椿（马甯）等多人就学集美。在这里，他贪婪地阅读《新青年》、《响导》等许多进步书刊，也撰写揭露现实、抨击时弊的文章，在校刊上发表。一年后，学校闹风潮停课，学生都散回家乡。

郭滴人于一九二四年春回到家里，就近觅得一初小教席，暂作安身。他教学有方，工作认真负责，在乡里的许多教师中（湖洋是大乡村，人口四、五千，有五个初小，一个高小），他最受赞赏。教学余暇，他常参与家里的农事劳动，夜晚则孜孜不倦地阅读古今中外的书刊（他向朋友们借来大量书籍，他的好友郭友才还资助他长期订了《新青年》），他也常与附近的农民谈心，一股变革旧世界的火苗在胸腔里越烧越旺。当时，统治龙岩的北洋军伐赖世璜和地方豪绅相勾结，强迫农民腾出一半土地种植鸦片，规定每亩征收鸦片捐大洋十二元，不种或歉收的，均不得减免，群众怨声载道。郭滴人挺身而出，组织各校教师，发动学生和农民，手持“种烟必拔、包捐必杀”的纸旗，在龙门、石碑前、小池等地进行抗烟示威。军伐赖世璜到处张贴告示：“煽动抗种鸦牙者，予以军法惩处。”郭滴人毫不畏惧，在群众大会上义正辞严地指出鸦片的种种危害，揭露军伐豪绅逼害农民的罪行，号召奋起抗争。《岩声报》也发表《湖邦社反对种烟的声浪》文章，支持郭滴人带领群众的革命行动。经过斗争，终于使赖世璜的逼种鸦片阴谋不能得逞。

一九二六年春，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招收学员，他得到好友郭朝隆、郭友才的支持并资助路费，决定前去。临行前，三人在积山初小合照了相（这是他仅有的一张留影。他的其他影片及所有文件，连同他家的房屋被敌人焚毁，或在长年战乱中散失了）。他路经漳州时，邀约李联星（一九二九年在漳被国民党杀害）、陈庆隆、朱文昭等人，同赴广

州，被录取进入“农讲所”为学员。“农讲所”的主持人是毛泽东，主要讲师有周恩来、肖楚女、林伯渠、彭湃、恽代英等党的领导人。

充满活力的革命良种投入阳光雨露的春天。郭滴人来到“农讲所”，学到了马列主义革命真理，掌握了基本的斗争策略。更主要的是他从此坚定了为解放全人类而奋斗终生的心志。不久（一九二六年六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要“把点点滴滴心血献给人民”，他于是改名为“滴人”。

由于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农讲所”提前于九月结业，学员都分配到各路北伐军随军工作。一九二六年十月，郭滴人与陈庆隆、朱文昭等以“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福建汀漳龙特派员”的身份随北伐军回到龙岩，支持协助国民党龙岩县党部左派分子陈国华、陈树槐、倪天长以及国民党“岩平宁政治监察署”主任张旭高等人开展工作。他们召开了各界民众代表会议，讨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各种改革工作，决定实行二五减租、组织农民协会、打倒土豪劣绅等等。会后还扣押了“猪仔议员”连贤基。不久，张旭高又带领一批青年到白土烧毁“天子”大神象。这些行动震撼了龙岩地区城乡，使人预感“风暴”即将到来。

这一时期，郭滴人除协助国民党县党部左派开展宣传外，他和陈隆还在城里设办了“岩平宁宣传人员养成所”，培训农运骨干。他也经常回湖洋乡里，与农民谈心，在积山小学讲课（每星期一、二天），介绍海陆丰农民暴动情况，讲革命翻身道理；他紧密地团结当地的许多知识青年，联系从武昌大学、上海艺专回乡青年张炳堂、张延竹（都是党员）以及学校教师黄鹤、罗超、郭乐生等编排许多剧目，公开演出（当时叫文明戏），吸引了全乡群众，起了效果不小的宣传启发作用。这一时期，郭滴人也常到西陂、东肖各乡串联，结识不少进步青年。他把大量宣传文件送入省立第九中学，出色地做了学运工作（这个中学的许多学生后来都投入革命，成为红色政权的积极分子）。

一九二七年一月，经过革命斗争的考验，郭滴人、陈庆隆把陈国华、谢宝萱（城区），陈柏生、陈品三、陈坤照（后田）、罗怀盛、罗超（龙门）、陈根源、郭乐生、郭锦荣（湖洋）等人吸收入党，并建立了党支部。党的工作向农村纵深发展。二七年二、三月间，湖邦的考塘、湖洋乡农民协会相继成立。在一次大会上，国民党右派郑菊人以“上层人士”自居，骄傲地对农民说：“你们的本分是耕田。地主租给你们土地，你们就老老实实耕种。只要不妄动，有什么困难，地主是会怜悯你们，也会帮助你们的。”郭滴人听了这一派胡言，立即给予狠狠痛斥：“农民整天辛苦耕作，吃不饱穿不暖，卖子借债过日子。地主不劳动，手白脚嫩，作威作福，到底是地主养活农民，还是农民养活地主？”一席话驳得郑菊人面红耳赤，悄悄溜出会场。会后，郭滴人带领农民协会会员游行示威。地主们惶恐万状，丧魂落魄地叹道：“滚地龙造反了！”

“四·一二”，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仅隔四、五天，龙岩反动势力的代表杜连鼎之流也采取了反革命行动。他们捣毁岩平宁监察署和国民党县党部，解散农会和工会组织，捕捉左派分子。张旭高、陈庆隆逃亡海外（张在菲律宾仍坚持革命活动，抗日战争时在菲被日军杀害。陈于解放初回国工作）。郭滴人转入地下，不停息地来往于湖邦、江山、西陂、董邦、东肖乡间，积极进行农运工作，吸收了许多斗争坚决、觉悟较高的贫雇农，组织秘密农会。后田的陈锦辉、湖洋的郭益乾、郭义海、郭狗哉，江山的郭金满、廖秀芳等等则是最早入党的农民。后田和湖洋最先建立农村党支部，其后西陂、董邦、石粉、江山也

都建立了。秘密农会在许多农村组成。反动派到处侦伺，企图捉拿郭滴人，但他在广大农民兄弟的严密保护下，安然无恙。这期间，他还与永定上杭各县党的领导人张鼎丞、蓝为仁、林心尧等同志密切联系，研究斗争策略，相互支援。

一九二七年七月间，年纪较大、见多识广、经验丰富的邓子恢从江西回来龙岩，与郭滴人结为亲密战友，一起领导着党在农村的组建工作。八月，出现了新的政治局面，国民党省党部改组，闽西各县党部也随之恢复，仍吸收了一些左派分子及共产党员。龙岩县党部常务委员苏庆云就是左派分子（后来也参加中共），子恢、滴人和谢宝萱分别担任秘书、组织、宣传等职务。同时，驻军换防，土匪军伐陈国辉来到龙岩，伪装开明进步，企图拉拢革命势力支持。于是，邓、郭利用这一机会，公开开展工农运动，除适中、溪口、白沙、雁石外，各区都建立了“党支部——秘密农会——公开农会”三套组织，实行了二五减租。党在群众中深深扎根，成为坚实的领导核心。这三套组织形式，具有坚强的战斗力和充分的灵活性，使党便于应付任何情况，经得起风险。

十一月，蒋光鼐、蔡廷楷的国民党十一军路过龙岩，声言要肃清闽南土匪。滴人与子恢商量，利用这一时机，联系十一军打击陈国辉及其在岩城的爪牙。决定组织群众欢迎十一军，而陈国辉已先闻风仓皇撤往漳平，于是愤怒的群众在邓郭的带领下捣毁了陈国辉的走狗林尚轩、林树宏和王梓兰三家房子。不久，陈国辉反扑龙岩，立刻厉行凶残的白色恐怖，共产党员陈国华、林克武等四、五人被捕杀，郭锦荣等党员及革命群众数十人被捕入狱，还悬赏银洋万元缉拿郭、邓二人。

为适应形势的发展及斗争的需要，中共龙岩县委这时成立了，罗怀盛为书记，郭滴人任组织部长，邓子恢任宣传部长，陈品三任军事部长。县委设在后田村。不久，省委派人来闽西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及福建省委关于“争取群众，武装暴动，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的重要决定。龙岩县委坚决执行上级指示，结合本县实际，加紧了宣传组织工作，更深入地发动群众抗缴所有捐税，发动对地主、族长的算账斗争，公开宣传土地革命。郭滴人了解到地主豪绅正在收买拳术馆，妄想用以威吓控制农民，当即通过秘密农会在学武术的青年农民中揭露地主的阴谋，并亲自回到湖洋密访拳师郭炎照、郭秀二，二人又邀其师兄徐秀寰（当时最有威望的拳师）来到炎照家里。滴人与之畅谈彻夜，这些崇尚“义气”的拳师无不被滴人的精辟说理折服，都真诚表示支持农民革命。第二年大暴动时，拳师及其徒弟青年农民们果成为声威显赫的暴动队的骨干。其中魏金水、陈昌贵、陈斗米、郭义德等后来都成为出色的军事领导干部。

二八年初，后田地主收买狗腿企图暗杀农会干部。党支部决定先下手为强。县委认为后田暴动时机成熟，批准了他们的决议。三月四日晚，郭滴人、邓子恢领导后田农会会员大闹“关帝福”，枪杀了地主狗腿陈北瑞，收缴地主武装，烧毁田契、借约，宣布旧债不还，田租不交，田地将由农民分配。第二天，破仓分粮。为了防备敌人的进攻，三月八日成立了后田游击队。县委并即通知各区乡相机行动，但地主多已逃跑，只收缴了部分武器。

后田的枪声揭开了闽西暴动的序幕，掀起工农群众汹涌不息浪潮。从此闽西各地区农民的“闹事”，时有所闻。郭滴人和邓子恢总结了后田的经验，更频繁地深入农民群众，扩展并加强党和秘密农会的组织。郭、邓还常运用群众所喜爱的山歌形式，大量编写了饶有风趣、寓意深刻的歌词，让人抄写到处张贴，虽屡遭反动派的爪牙撕毁，但山歌易记好

唱，很快就被群众广泛传诵。它鼓舞人心，激励斗志。而反动派则惶惶不可终日，预感风暴即将来临，也在准备疯狂挣扎。

七月三十日，省委指示举行大暴动，集中岩永杭三县边境农民武装攻打龙岩城及永定坎市。农民所持武器只有梭标、大刀、鸟铳和为数不多的单响步枪，无法战胜敌人的汉阳、广东制造的五响步枪及轻重机枪，战斗失利。不久，子恢被调往上杭主持县委工作，怀盛也调去漳州。年仅廿二岁的郭滴人要在龙岩独当一面，总揽全盘。此时敌我矛盾已趋白热化，斗争极其复杂尖锐；农村党组织及秘密农会需要加强领导。形势迫人，滴人变得老成持重，他善于征求、综合群众和干部的意见，他把自己的全部时间、精力投入迎接大暴动的准备工作。

十一月，闽西特委在永定合溪召开扩大会议，子恢、滴人都参加了。省委书记罗明传达“六大”精神，指示加紧发动、组织群众，准备进行大暴动。

二九年三月，郭滴人在龙岩中甲附近山村召开了第一次全县党代会，特委书记邓子恢也赶来参加。大会通过了“争取群众，准备武装暴动，推翻陈国辉反动统治，实现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政权”的方针。会后，滴人还和子恢共同起草印发《为打倒陈国辉，实行土地革命告群众书》，并即着手发展游击队，扩大武装，准备迎接红军。紧接着，朱、毛率领红四军入闽，初战就歼灭长汀军伐郭凤鸣部三千余人，郭凤鸣本人也被击毙。这一震撼八闽的喜讯更是激励着龙岩的革命群众。郭滴人和县委的同志们紧张地进行全县总暴动的部署。五月二十一日深夜，县委接到通知，红四军向龙岩进发，郭滴人连夜赶往小池，面向毛委员朱军长汇报龙岩各方面情况。红四军于二十三日攻克龙岩城，歼灭陈国辉留守部队一个营（陈率主力在粤东同广东军伐混战）。其时各区乡农民都按照县委原先的部署，举行了武装暴动，一举推翻在农村的反动政权。除溪口、白沙、适中外，各乡都竖起了红旗。滴人陪同毛委员进城，毛委员并即到龙岩九中演说。

为了诱使陈国辉主力赶回龙岩，红四军迅速撤离。六月十九日红四军在农民暴动队的紧密配合下，再次围攻龙岩城，全歼陈国辉主力二千余人，龙岩人民第一次翻了身。九月举行了全县工农兵代表大会，龙岩县苏维埃政府诞生，郭滴人当选为主席。解放伊始，区乡政权的建立，儿童团、少先队、妇女队、赤卫队和工会农会等群众组织的建立整顿，培训师资，设办学校，整理财政经济等等工作，千头万绪，滴人都积极地担负起来。他善于发动干部、依靠群众，使纷繁的工作都能有条不紊地得到妥善处理。为了解放生产力，处理农民最关注的土地问题，他和子恢综合了群众意见，制定分田政策，以后田乡为分田试点。二人亲自下去指导，取得经验后，即在全县开展土地改革。地主的田契烧毁了，农民都真正分到土地。其后从三二年至四九年解放，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时期，“闽西红旗不倒”，中共闽粤赣边区党委和龙岩县委仍然领导着农民进行斗争。一些地主只夺回少数农田，大部分土地仍在农民手中。

三〇年三月，在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郭滴人当选为闽西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子恢任主席。七月，子恢调厦门、福州主持地下工作，张鼎承接任主席，滴人当选为中共闽西特委书记。从二六年至三〇年，滴人与子恢、鼎承亲密合作，在闽西建立红色政权，培养数千党员、干部，领导分田斗争、军事建设、创建红十二军、廿一军，发展经济，整顿文化教育，都做了大量工作。

三〇年底，国民党张贞部队进犯龙岩，闽西政府撤往岩杭永交界的虎岗乡。郭滴人调

任中共闽粤赣边党委宣传部长。卅一年春，闽西政府肃反委员会主席林一株执行极左路线，以所谓“社会民主党”事件，大搞逼供信，几个月内，数以万计的优秀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戮。卅一年七月，党中央派滴人和鼎承回闽西撤查此案，还拨给五千元作为善后救济费。终于处决了双手沾满闽西无数革命志士鲜血的林一株，平息了这一惨不忍闻的所谓“社党事件”（解放后，所有以“社党分子”被林一株杀害的革命干部和群众，都追认为“革命烈士”，其家属也得到抚恤）。

卅一年十一月，郭滴人被任命为国家政治保卫局福建分局长。三二年，当选为福建省苏维埃政府文化部长，以后又历任省委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军事政治部、宣传部、地方工作部部长等职。

一九三四年十月，郭滴人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红一方面军第三军团负责“民运”工作，一路餐风宿露，奔波劳累，不幸肺病复发，又患痢疾，他坚毅地克服了难以想象的许多艰难困苦，在行军中坚持做群众工作。到达陕北后，调任中央局干部科科长。他不顾身体虚弱，带病工作，经常咯血，到了病危不起时，他在病榻上还计划着写一部《红军长征记》，只写了《广西徭民回忆录》一个篇章，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年仅三十岁的郭滴人停止了呼吸。人们万分悲痛，党中央为他举行了追悼会，毛主席和其他领导同志亲临参加，表达哀思，称赞他是中国农民运动的最优秀干部。

一九五六年十月，龙岩修建闽西革命烈士纪念碑，党中央派人把滴人骨灰从陕北运回龙岩，在城西松柏葱郁的虎岭山上、闽西革命烈士纪念碑的左侧安葬。滴人的老战友邓子恢、张鼎承正好在南方视察，也赶来参加滴人的安葬仪式。邓子恢作了《纪念闽西的伟大革命者郭滴人》的讲话，指出郭滴人同志短暂而又光辉的一生为闽西人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榜样，将永远受到闽西人民的尊敬和纪念。

快 板 （流行于土地革命时期）

国民党，骗士兵，打北京，打下来，就戡兵。戡下来，怎安身？回家去，无田耕，一条路，投红军。

党内无党，帝王思想。党外无派，千奇百怪。三民主义，挂名骗人。建国大纲，官样文章。建国方略，夹七夹八。军政时期，军阀得意；训政时期，土豪神气；宪政时期，遥遥无期；总理遗嘱，阿弥陀佛。

（中生辑录）

注：孙中山先生死后，国民党规定所有机关单位每星期一都要作纪念活动，全场朗诵“总理遗嘱”，形同和尚念经。

闽西事变与半山事件等革命 历史片断的回忆

林映雪

(一) 被逐出圻

我于一九〇九年出生在龙岩县白岩区谢家邦乡的一个贫苦农民家里。当我十二岁的时候，父亲即已病逝；十八岁的时候，母亲又因病不幸离开了人间。为了寻找生活出路，我便于一九二七年底，跟随邻乡铁石洋的一位姓张的老番客远涉重洋，飘泊到了马来亚的檳城，当了一家商店的店员。一九二九年，邓坤均同志介绍我加入了工会，积极参加当地工人的罢工斗争。不久，又由邓潮海、郭乾照二位同志介绍我参加了马来亚共产党。（当时，我的思想认识是十分幼稚的，认为工人们如果都组织团结起来，一定能把工厂、商店的剥削者——资本家打倒；农民们如果都组织团结起来，也一定能把收租的剥削者——地主恶霸打倒。这样工农劳苦大众就能获得解放，革命就会成功了。）

是年“五卅”惨案四周年纪念日，我们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革命宣传活动。我领来了一大批传单，跟同志们一起到大街上散发、宣传，鼓动群众反对日本等帝国主义。当地反动政府看见情势不妙，便出兵镇压。我被敌人捉去了。同时被捕的还有八个革命青年，他们是吴松发（曹溪人）、邓文芹（中兴人）、张五苟（铁山人）、林日高（蒋武人）、林木海（雁石人）、曹昌古（红坊人）、张奶仔（湖邦人）、还有一个湖邦人名字忘了。我们虽然在监牢里过着囚徒的非人生活，但革命意志得到了磨炼。有一天党通过关系偷偷送了一张报纸给我们，上面刊登了龙岩共产党暴动的消息。同志们看了以后，感到万分的高兴。我心里想，如果能马上回到龙岩去参加革命那多好啊！这个日思夜想的愿望终于在坐牢半年之后实现了。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当地反动政府将我们驱逐出境，押送到香港再转到了厦门，始得自由。

在厦门时，我们都像乞丐一样，身无分文，要回龙岩，连路费都没有。幸好，我表兄倪秉铨从印尼苏门答腊汇来了一百块钱。我便将这笔钱拿出来供同志们做路费之用。九个人除留下二人在厦门之外，其余七人分作两批回龙岩。我满怀着革命的激情，从厦门经过几天的行程，回到了日夜盼望的经过革命洗礼的红色故乡。住在家里的時候，有的邻居说我是被驱逐出境的“番乞”。但是，我自己却並不因此而难堪，反而引以自豪。一则，因为自己在国外参加了革命；二则，在家后的两个哥哥两个嫂嫂也都参加了革命——一九二九年五月间，朱毛红军解放龙岩时，他们都参加了当地的农民暴动。是年冬，由于闽粤赣三省敌人围剿闽西革命根据地，我家里东西被敌人抢光了，房子也被烧了，一个嫂嫂被敌人抓去吊打重伤至死，一个哥哥被敌人抓去吊打至伤残（另一嫂嫂和哥哥也先后于一九三二年和一九三五年为革命而光荣牺牲了，此是后话）。此情此景，更加激起我对敌人的满腔仇恨，也更加坚定了我参加革命的决心。

一九三〇年一月，龙岩县委分配我到县总工会搞财政工作，以后历任岩杭中心县委和

龙岩县苏维埃政府文书，一九三四年四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以后，我便在党的怀抱里逐步成长，决心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先后经历了艰苦卓绝的闽西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二）闽西事变

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七日，国民党反动派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对我皖南的新四军部队实行了突然的包围袭击，致使我新四军部队受到惨重的损失。

同年一月二十日，闽西的国民党反动派也跟着发动了“闽西事变”。

在闽西事变之前，我闽西各县委、区委领导干部，正集中在龙岩东肖参加闽西南特委扩大会议。当事变的前一天，我接到统战人士翁九如送给我一张报纸。该报上刊登了一则“皖南事变”的消息。我看到后，叫通讯员林钟鸣同志立即将此报送去东肖给特委领导同志。当特委接到这一讯息时，立即决定扩大会议停止召开，并布置与会干部，在当天晚上赶回各地把人员集中上山，以防万一。当时，闽西南特委和各县委、区委大都执行了这一紧急指示，只有龙岩县委没有执行好，致遭严重损失。

一月二十日凌晨，国民党保安团第九团几百人包围了龙岩县委驻地——西陂条围村。当敌情发生时，有的同志慌中无计，各自乱冲，暴露了目标。通讯员林钟鸣同志在突围时，不幸中弹，英勇牺牲了；县委宣传部长陈阿细同志夫妇和通讯员郭××，牛皮（土名）同志等四人不幸被捕；我（当时在县委负责财政兼文书工作）和通讯员陈锦华同志看到当时敌情严重，认为不能乱冲，便躲藏起来。我听到枪声以后，便先跑进一个群众的甘蔗园里，观察了一会敌人的动向之后，便当机立断地把所带的一袋子东西连同棉大衣，藏在甘蔗园里，然后敏捷地跑进附近一个厕所里藏起来。寒冬腊月的天气虽然很冷，但为了躲过敌人的搜捕，我在厕所的粪水里整整站了两三个钟头之久，接着便听到敌人吹收兵号，敌人把队伍撤回城里去了。这时，我便从厕所里起来，沿着偏僻的田间小道走出了条围村，来到了马厝岭接头户“螃蟹”同志家里。他看见我鞋子、裤子都是湿臭的，便不说而知了，当即拿出他自己的裤子和鞋子给我换了，并给我吃饱了饭。我拿出五十元交给他，交代他将此钱转交给林钟鸣烈士的母亲陈三姑，供她作善后安家之用。

事后听说，敌人在当天下午又重新包围了条围村，妄图抓我和陈锦华等同志。当时敌人把各户家长 and 保甲长集中在一起审问，有的被敌人捕去坐牢。以后还在各地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及其家属。如魏金水同志的家属六人被捕去坐牢，在牢里被关死了三人（父、子、和弟妻）；吴作球同志的家属三人当场被杀害二人（妻、内弟），连三岁的孩子也被抢走；我的家属三人（岳母、妻、女孩子）被捕坐牢后，老婆被迫改嫁；邱梅发同志的老婆也被迫改嫁；郑金旺、陈水锦、潘九三、章雪溪等同志的老婆均被捕坐牢；统战对象翁九如、陈水洪两人，也被捕坐牢受难。

（三）隐蔽生产

“闽西事变”以后，天空布满了乌云。闽西国共两党团结抗日的局面宣告结束。我们在闽西的党组织和武装力量被迫转入了“隐蔽生产、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斗争阶段。

一九四二年中秋节的晚上，我们同两特委机关的十三位同志，离开已住了很久的美丽溪，转移到白岩丘地。丘地深山密林，是个很小的山村，只有四户穷苦人家，都是最可靠的革命群众。村子里的接头户叫林佩环，是个五十多岁的地下党员。我们一到，他就像见到亲人一样，马上给我们烧汤煮饭，安排我们休息的地方。以前，我们也常到这个地方，但人不多，也没有带什么东西。这一次，他看我们特委机关的同志都来了，还挑了个公文箱，就高兴的问：“你们是不是要在这里住下来呀？”特委书记魏金水同志一听到他问，便微笑着说：“是呀，林佩环同志，有没有好住的地方？”林佩环同志连声说：“有有有，我们的革命同志来了，还怕没有好住的地方吗？”第二天，他就带我们两个同志进山找到了一个叫做东水坑的好地方。东水坑距丘地四五里路程，距邻乡有十来里路，过去三年游击战争时，红八团也曾经在此住过。这里四周山高林密，中间一条坑，环境隐蔽，除了出红菇的季节，有个别群众前来采菇之外，平日就难得见到人影，确是个隐蔽的好地方。在群众的帮助之下，我们就在这里搭起寮子，住了下来，隐蔽生产，坚持斗争。

刚开始的时候，由于条件差，又没有经验，困难可真不少。那时，我们和上级党组织的联系也已中断，无法接济，只有依靠群众支持和同志们劳动生产，达到自给。当时山上虽有荒地可开，但每年只能种一季稻子，节气又已过了，眼前该怎么办呢？在研究会上，群众替我们出了好主意。林佩环同志说：“同志呀，不能种稻子，我们就先开荒，种地瓜，种青菜；未暴露身分的同志，可以化装下山，到外头帮人做工，赚点米粮回来。眼下你们的生活有困难，我们说什么都要支持你们。我们四家人愿意捐出四担谷子给你们，先把炉灶支起来再说。”林佩环一边说，坐在旁边的群众一直不住地点头。大家听了，都十分感动。会议结束时，魏金水同志再三向群众道谢，并决定采纳他们的中肯意见。会后，魏金水同志就指派了丘锦才、魏利水、章荫木、陈水锦、郑永清五人假说是逃壮丁的，下山帮人做工。林石彝、林石桂二人在山上做木桶家具，马发贤和我们会做篾工，也被指定留在山里编谷箩、菜篮、畚箕等竹器，其余的人就安排养猪、养鸡，搞副业生产。马发贤同志的爱人王仁招同志专门负责煮饭和洗衣服等。

就这样，在寮子边，我们开了两亩多荒地，种下了地瓜和各种冬生早熟的菜，积极地干了起来。魏书记是个生产能手，不论什么劳动，他都是一马当先带头干。开荒时，只见他举起锄头轻，放下锄头重，动作又快又好，一看就知道是个老手。同志们都选他做生产队的队长。陈卜仁付书记是知识分子出身，但干起活来，不怕艰苦，手掌打起泡，流血，仍旧坚持天天干，从来不肯休息，被同志们评为劳动模范。大家在负责同志的带动下，都精神抖擞，干劲十足。我们生产了许多谷箩、菜篮、畚箕，以及各种各样的用具，都由群众挑到圩上去卖，换回粮食和油盐。下山帮工的同志，也三五天回来一次，把赚来的工钱买了米、油、盐、菜等带回来。有时我们还下河抓鱼，到山沟里抓“石当”（美味的大蛙）拿去卖钱增加收入。经过这样的努力，困难得到了初步解决，生活也安定下来了。

翌年开春，为了粮食生产问题，林佩环又把他靠山的自耕田让给我们种，这样便于隐蔽，不容易暴露目标。他自己却另外去开荒。没有耕牛、种子，林佩环都替我们想出了妥善的解决的办法。林佩环是个非常聪明精细的人，他看出我们想买猪喂，没有本钱，他就买了一头小猪，要我们喂大卖了再还他本钱；还把自己家里孵的小鸡，拿来送给我们。对他这种热情的支持和帮助，同志们都十分感动。就这样，我们在上级党的正确方针指引下，在魏、陈书记的领导下，在革命群众的帮助支持下，顺利地进行了隐蔽生产斗争。

然而，国民党反动派时刻也没有放松对我们的进攻。他们用尽各种狡猾的手段来侦察我们的踪迹，企图对我们进行“军事清剿”，来个“一网打尽”。农历七月十五的晚上，是中元节。我们被群众接下山去，和他们一起吃酒过节。有两个同志喝醉了，没能按时转回寮子。恰巧这天下半夜，有两家群众被土匪把东西抢光了。群众跑来报告，要求这两个同志把土匪抢去的东西追回来。这两个同志一听说群众屋里东西被抢，又急又气，立刻就起身追赶土匪。一打枪，那群土匪果然丢下东西就跑。可是这枪一响，问题就跟着来了。原来这些抢东西的家伙，不是一般的经济土匪，而是国民党的政治土匪。他们长期侦察不出我们的目标，就用这种打家劫舍的办法来引诱我们出来。他们认为：敢来追击打枪，就说明这里有共产党；不然，老百姓怎敢来追，他们又哪里有枪呢？但是，由于群众的掩护，他们还摸不清情况，然而却开始注意了这块地区，情况也就严重起来了。

旧历八月的一个晚上，林石彝、林石桂两兄弟到铁石洋去背米和联系工作，不知那里的接头户名叫双生的已经被敌人收买了。林石彝一走进去，刚刚坐下，双生就奸笑着要借林石彝身上的枪看。林石彝刚一解下枪来，一群国民党保安团的武装，立即吆喝着，从屋外，屋角，床后一齐冲了出来。林石桂见势不妙，马上开枪抵抗。由于敌众我寡，当场牺牲了，林石彝也当场被捕。

当我们知道了这一情况后，为了保全革命力量，继续开展革命工作，我们特委机关决定暂时离开东水坑，转移到永定去继续隐蔽生产。只是十三个同志中，这时只剩下十一个了。后来，在对敌斗争中，又牺牲了六位同志，只剩下五个同志了。就在我们离开后不久，一九四四年，坚强的共产党员林佩环和他的两个孩子也被国民党反动派抓去，为了人民革命事业，都光荣牺牲了。

(四) 半山事件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之下，一方面打着和平谈判的旗号，拼命抢夺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另一方面又积极准备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因此，引起了全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以及进步人士的反对。中共为和平民主而进行了斗争。闽西党组织为了执行党中央关于“争取和平民主，停止内战”的方针，于1946年7月将武装队伍集中到粤东去，一面进行整训，一面开展新区工作。我和马发贤等同志，则留下来，主要任务是恢复闽西特委组织，以争取地方和平统战工作，恢复和发展老区工作等。接着闽西特委便正式恢复了，我任特派员，马发贤同志任副特派员。开始时特委机关驻在马发贤同志的家乡山上，即永定之西洋坪。不久又转移到永定的西溪半山，与杭永边工委谌青山等同志住在一起。刚住下三天，就被敌人发现，派兵来包围袭击我们，这就是“半山事件”。

在事件发生的前一天上午，有一个合溪村的群众（事后了解到这个人原是合溪保长之弟，解放后其兄弟二人已镇压），到半山来砍柴，发现了我们住的山寮和人员。我们当即把那个群众留下来，好生招待他，向他做宣传工作，叫他回去以后，要绝对保密，不能把所看到的情况暴露出去。为了证实他是否可靠，我拿一块钱托他代买米，约定他明天（旧历六月廿一日）上午八点以前要把米送来。这样，一直将他留到下午六点钟才让他回去。

可是，第二天约定的时间已经超过了，而那人还没来。我们恐生意外，便立刻部署，

一方面加强了岗哨；另一方面，则作好了转移的准备，因怕白天转移会暴露自己，所以打算到天黑时再转移。这样大家一直等到下午五点钟，还没发现什么情况。我们便叫放哨的同志一起来吃晚饭，然后转移。

当我们正在吃晚饭时，通讯员细妹子忽然首先发现了敌情，马发贤同志一听敌人来了，马上和细妹子一起冲出坑口抵御敌人；我和谌青山同志也带着七八个同志，跟着冲出去参加战斗。同志们都打得十分英勇顽强，但因敌众我寡，我炊事员阿五哥和邱其银同志的爱人英勇牺牲了；受伤后被敌人捕去的有马发贤和黄月英同志二人；被活捉去的有谌青山、马发贤同志的爱人和战士家属等六人。只有我和细妹子二人侥幸杀出重围。

我是怎样杀出来的呢？当我带着同志们冲出坑口时，看见马发贤同志脚腿负了重伤，细妹子同志隐蔽着没动。而敌人已从四面山头上包抄下来。马发贤同志叫我不要管他，要赶快想办法冲出去，在此危急关头，我和马发贤同志互相安慰了一番，表示：准备为革命流最后一滴血，即使为革命牺牲了也是光荣的。在准备要冲之前，马发贤同志把自己的驳壳枪换给了细妹子，他自己还有一把曲九和细妹子的长枪可以作为最后和敌人一拼之用。我和细妹子二人决心准备牺牲也要冲出去，于是我便端着枪，时而向山上，时而向山下，不断开枪，阻击敌人，并从半山腰直冲出去。冲了一阵，子弹打光了，当敌人发现我没子弹时，便在后面大喊要活捉我。突然间一颗子弹从我下巴擦皮而过，我负了伤，虽然鲜血直流，但赶紧找一个地方躲藏起来。当时夜幕降临，碰巧天下大雨，敌人四处搜索也找不到我，只好撤兵回去了。我摸黑走到另一个山口上，刚好碰到了从粤东回来的同志——邱二苟、邱其银、余佩仁、范富如同志，他们看我负了伤，赶紧把我带到粤东××山上与部队（队长刘永生同志）住在一起治伤。党领导人魏金水同志亲自来慰问我。不久我伤愈，重返战斗岗位。以后听说马发贤，谌青山等同志顽强不屈，被敌人残酷杀害了，为革命流了最后一滴血。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解放和共产主义事业而英勇地牺牲了，他们的革命精神将万古留芳，永世长存！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 邱林忠整理）

《少年先锋队歌》（土地革命时期歌曲）

走上前去呵！曙光在前，同志们奋斗！
用我们的刺刀和枪炮开自己的路。
勇敢向前，稳着脚步，要高举起先锋旗帜。
我们是工人和农民的少年先锋队，
我们是工人和农民的少年先锋队，

（方中辑录）